

Shen Zhen Gu Shi Feng Yun



深圳股市風雲

張建偉 張躍進 著

- 鄧小平深圳言股市
- 岡崎嘉平太給中國出的難題
- 紅色中國第一張股票
- 明夜暗為非法交易猖狂



- 股市初寒，牛市走向熊市
- 風雨如磐的深圳股市
- 股東沙龍“快買快賣”

南開大學出版社

深圳股市风云

张建伟 张跃进 汪景钢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11号

深圳股市风云

张建伟 张跃进 汪景钢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300071 电话:349318 31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7.5

字数:185千

印数:1—50000

ISBN: 313·00304·2 F·89

定价:3.30元

邓小平深圳论股市

1992年元月下旬，邓小平同志南巡深圳。在了解深圳股票市场情况之后，邓小平说：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上海、深圳先试验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

目 录

第一部 空谷足音

第一章 股市蜃楼

1. 冈崎嘉平太给中国出的难题	(1)
2. 东京朦胧观股市	(2)
3. 日本记者的“刁”问题	(5)
4. 未来的股市老板玩起电子	(6)
5. 中国不需要股市？	(8)

第二章 开国第一声

6. 大风起兮云飞扬	(9)
7. 红色中国第一张股票	(12)
8. 畏畏缩缩·深圳人谈股色变	(13)
9. 身先士卒·市委书记带头认股	(14)

第三章 京华辩难

10. 初涉京华	(15)
11. 牛奶启示录	(17)
12. 二涉京华	(19)
13. 北京派员南下查勘股份化	(22)
14. 三涉京华	(22)
15. 独步中华·股份银行第一家	(23)

第二部 风云变幻

第四章 惊蛰初醒

16. 发行新股·股票市场初具雏形	(25)
17. 大喜过望·股份制终显神通	(27)
18. 钞票诱人·深圳人纷纷入市	(29)

第五章 狂飙突起

19. 排山倒海的价格魔力	(30)
20. 野马脱僵·供需严重失衡	(31)
21. 明浪暗涌·非法交易猖狂	(33)
22. 深圳人“疯”了？	(36)

第三部 钟声响了

第六章 掌门人出山

23. 政府明智·初定大计治股市.....	(38)
24. 招贤纳宝·市长觅贤挂帅交易所.....	(41)
25. 大鹏欲去·创业人难酬鸿鹄志.....	(43)
26. 三顾六楼·禹国刚剖陈事业心.....	(45)
27. 市长定计·为请贤断下官场令.....	(47)
28. 情有所钟·再创业涓涓一片心.....	(48)

第七章 跨制度悖论

29. “5.28 公告”	(51)
30. “好得很与糟得很”.....	(53)
31. “管还是不管好”.....	(55)
32. 股市呼唤“三公”.....	(60)

第八章 蓝皮书

33. 移植法规·“中国特色”故事(一).....	(61)
34. 双重方案·“中国特色”故事(二).....	(62)
35. 忍字当头·“中国特色”故事(三).....	(65)

第九章 钟声响了

36. 高级争端·电脑手工分歧路.....	(67)
37. 万事俱备·推迟开业为哪般?	(69)
38. 疑航舵手·临风驻足果决断.....	(71)
39. 恶毒陷害·欲造空市酿丑闻.....	(73)
40. 钟声响了·凿空华夏第一声.....	(74)

第四部 沧海横流

第十章 看不见的手

41. 股市初寒·牛市走向熊市.....	(76)
42. 红幕黑幕·股市谁人执法.....	(79)
43. 屡呼放狼·股民魂飞魄散.....	(81)
44. 捕风捉影·市场动荡不安.....	(82)
45. 龙头扩股·股东大会难开.....	(84)

46. 风雨如磐的深圳股市	(85)
---------------	------

第十一章 病困掌门人

47.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87)
48. 泪水为“绿色”而涌流	(89)
49. 一身系天下安危	(91)

第十二章 救市！十万火急！

50. 震惊全国的股市大跌泻	(94)
51. “救市会议”·秘卷(一)	(96)
52. “救市军团”·秘卷(二)	(99)
53. “救市战局”·秘卷(三)	(100)
54. 拯救历史的重负	(101)

第十三章 大决战

55. 一锅夹生饭·两亿决战 50 亿！	(102)
56. 木牛流马·支撑到最后一秒钟	(104)
57. 股东沙龙：“快买哟！”	(106)
58. 十月二日：历史不会忘记	(108)
59. 伟大的贡献	(110)

第一部 空谷足音

第一章 股市蜃楼

1. 冈崎嘉平太给中国出的难题

1983年春。

日本东京，新桥第一饭店，欢迎中国研修留学生的大会上。看着这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冈崎嘉平太先生的脸上流露着满意的笑容。

作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冈崎嘉平太先生，曾不只一次地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留学生而出力。然而每次他都感到有什么欠缺。

唯独这次，他觉得是那么完满，那就是这次中国政府终于派出了学习证券的专门人员。这是冈崎先生多年来的夙愿。

冈崎先生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自从五十年代起，就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他与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副委员长私交甚笃。

这位在日本实业界极有名望的老翁，或许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先见之明，在许多年前就要求中国派人员到日本学习证券专业。因为根据他的经验，要想发展经济，搞建设，只靠银行融资是远远无法满足建设需求的。就好比一个人，只靠一条腿走路，永远也不会走得很稳。因此依靠资本市场融资，就算为社会发展安上了另一条腿。

固执的老人啊！自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之路，中国大陆，再没有了证券市场，更没有证券管理专业人员。他的要求真是给中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

我国的历史上，也曾有过证券（股票）交易。最早，始于19世纪末期，清朝末年，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我国开始出现股份有限公

司，随即出现了股票，但数量有限，未形成集中的股票市场。1888年，一些外商在我国组织的股票掮客公会，专门从事外国股票的交易业务，这是我国最早的股票交易市场。1902年，清政府将其改组为上海众业公所。该所除继续从事外国的股票交易外，也经营外商在华设立的各公司的股票。

同一时期，梁启超等倡议组织股份公司，并制造舆论，提高人们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认识，扩大其影响。当时，我国工商界中的较大企业逐渐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股票日益增加，股票持有人便出入于茶馆进行股票交易，于是，茶馆便成了股票交易市场。这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这种市场最早于宣统年间出现在上海南京路的惠芳茶楼，1914年迁至四马路（今福州路）。交易者多为茶商、丝商及洋行轮船买办。其后，股票交易日渐增多，并出现了专门经营股票的商人。

1913年，国民政府农商部召开专门会议商讨股票交易所事宜，并决定在重要商业城市设立证券交易所。1914年，财政部又提倡官商合办交易所，由于当时正值混乱之际，未能实现。但在此期间，一些股票商人则在上海组织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该会设在二马路（今九江路）渭水坊，会员有12家，后来增至15家。该会规定，会员可推选重要职员为公会代表，并缴纳白银12两作为资本，每月交会费白银2两；交易对象包括政府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及外汇等；股票交易均为现货，行情逐日向同业公布，并印送行市单；股票佣金按1—5%计收；每天上午9—11时营业，并且规定对失信或犯规者进行制裁，公会

成立后，交易十分活跃，各会员都获得了颇丰厚的利润。

1914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我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条例，随后一些大城市相继正式成立了证券交易所。1918年，北京证券所宣告成立，这是经正式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02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同年，又在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的基础上组成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以后，又于1931、1932、1935年分别成立了宁波证券交易所、中国股票推进会、汉口证券交易所等股票证券市场。上海是我国的重要港口城市，工商业较为发达。解放前一直是我国的金融中心，所以上海的证券市场较之其他城市要发达。解放前，我国的证券交易基本集中在上海，其他城市虽然也成立过证券交易所，但后来都因各种原因先后夭折。

解放初期我国唯一的天津证券交易所设在天津市和平区原六国饭店（今承德道5号）。该所的经营方针，明确以诱导和吸引游资，使之纳入生产轨道为目标，并强调证券种类为国内公司企业的股票，限现货交易，次日交割，不做期货交易，严禁买空卖空。

天津证券交易所有经纪人39人，其中具有法人资格的经纪人，即各银行信托部的代表，主要有新华、金城、中国实业、浙江兴业、永安等银行的信托部；另外有个经纪人，即专门经营证券买卖的证券行代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主要有启新洋灰、滦州矿务、江南水泥、东亚毛呢、仁立毛纺、寿丰面粉、济安自来水、天津造膜等公司企业的股票。

天津证券交易所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办的。天津解放后，随着全国统一财政政策，稳定金融物价的工作顺利展开，国营商业大量抛售物资，平抑物价，国家银行紧缩对私贷款，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现金管理，财政催缴税款，发行公债券，同时对不法投机倒把分子进行严厉打击，从而使金融市场物价情况出现正常稳定的局面，通过证券交易所吸引游资的意义已不复存在。因此，于

1952年7月由政府决定，关闭了天津证券交易所。

至此，证券市场在中国大陆失踪多年。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冈崎先生更加预感到，要想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资本市场肯定会在我国出现，相对应的证券市场一定会需要大批的人才。

因此，从1981年起，就一次次地向廖承志副委员长提及派员到日本专修证券管理。然而，每次的要求都被中国政府婉转地回绝了。但是固执的老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仍然向中国政府提着同样的要求……

今天，他笑了。望着台上致谢词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老人的心象是喝进一杯醇香的浓茶。他清楚地记着这位发言人的名字——禹国刚。

他毫不怀疑，这位年轻人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证券事业的希望……。

2. 东京朦胧观股市

1983年，应日方要求，中日友好协会，中国青年联合会第一次选派两名留学生，专修证券专业。

然而，选拔这样两名留学生，又是何等的艰难。因为研修留学生和其他留学生不同。他们没有时间在语言上浪费时间。只要踏上日本国土，第二天就要投入紧张的专业学习。因此，需要有良好的语言基础和有关证券方面的基本知识。为此，团中央负责同志，跑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最后在成千上万的竞争者中选定禹国刚和另外一名同志。

此时，禹国刚还只是深圳爱华电器公司的党委办公室秘书。凭借他良好的日语基础和平时广博积累（当时在中国懂得股票的人还很少，能够了解股票的一些基本知识已是很难得了）。一路上过关斩将，力挫群雄，在成千上万的竞争者中独领风骚，荣登榜首。

何为股票？在中国50岁往上人的眼里，那简直是洪水猛兽。而在新中国40岁以下

的人，只在茅盾的《子夜》与麦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影片《华尔街》中看到过股票市场疯狂的景象。

“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籽。”抑或“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像变魔术一样，一贫如洗的人，一夜之间腰缠万贯，百万富翁眨眼间囊空如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股票交易等于赌博。

别看禹国刚已登上东去的飞机，然而，心中却依然留下无限的困惑。学完之后在中国有用吗？中国也能搞证券市场吗？社会主义也需要这些？心里翻腾着一个个谜团。

日本，他们的第一位老师——阿步正思，他对留学生的要求极简单：除每天的理论学习之外，就是到丸庄证券（证券公司名称）一个部、一个部实际学习，观摩。

用阿步的话讲，我在证券公司干的时候，就是一个部、一个部学的，各个部我都干过。现在我任公司的总务部长（在日本总务部兼人事、财务、总务于一身）因为了解每个部的情况，所以任何事情都瞒不过我的眼睛。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如此，绝对不能有半点懈怠！你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于是，紧张的学习便拉开了序幕。每天8小时的学习，再加上往返乘地铁的时间和在宿舍的复习时间，每天起码有13~14小时是紧紧张张度过的。

日本的证券事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日元的增值，日本证券市场更是令世界瞩目。能在这里学习证券管理，真可谓千金难买，千载难逢。因此，禹国刚不愿浪费一点时间。在学习过程中，禹国刚渐渐明白：股票交易不单单具有赌博性，而且也是社会融资的极佳方法。

股票，在西方教科书中的定义为：“股票代表着企业的具有风险的那部分资本，股票是持有者作为企业所有人的证明，股东们共同享受企业的利润，但同时也共同承担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

这段文字读起来，着实有点绕嘴。通俗点

讲：股票不像其他的证券，买完之后，不能确保连本带息一起偿还。而股票是一种高风险投资，凡买股票者，企业不用偿还本金，只根据企业经营的效益按比例分红派息。另外，凡是买股票的人，就成为某个企业的股东——企业主人。由于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紧密相联，故尔，自然关心企业发展，监督企业的运行，这样做对于企业的健康成长无疑是件大好事。难怪证券事业在资本主义国家历久不衰。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社会中，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进展，出现了合伙经营的经济形式。其组织形式与股份公司相类似。但是在合伙内容、经营方式、分配办法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范，更没有形成严格的股份制度，因此，被认为是股份制的“原始形态”。

进入17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而且“生机蓬勃”。股份经济在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家相继出现。

17世纪中期，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城市成为了欧洲和近东之间的贸易中心，出现了邀请公众入股的城市商业组织，股东中间有商人、王公、廷臣、教授以及城市居民。据认为这就是最早具有股份制特征的股份公司。但是这种公司往往由官方出面组织，并监督其业务，而且股份不得转让，但投资者可以收回资本。

美洲大陆的地理大发现，使16世纪的国际贸易转到大西洋，英格兰成为更重要的贸易中心。在当时重商主义的政策下，英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垄断特权的以国际贸易和殖民为目的的贸易公司（也称独占公司）。如1553年成立的莫斯克尔公司，1660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特许成立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等。到1680年，通过股份集资成立和经营的公司已有49个。

17世纪英国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有个重大突破，即第一次确认了“公司”作为一个独立法人的观点。1657年，英国出现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公司组织，股本趋于变为不可退

回的长期投资。股息定期发放，股票可以出售，并出现了股票出售市场，传统的股份制度便逐渐过渡为现代的股份公司，完成了企业形式从独资、合伙到股份公司的发展过程。

现代股份公司一经确认便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到了 19 世纪，英国已有 115 家股份银行，1865 年又扩大为 250 家。18 世纪末，股份公司已成为人们熟悉的组织形式。美国只能算作后起之秀，但在 1800 年时已有 219 个桥梁公司，67 个银行、保险公司和 6 个制造公司。1818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该所从事的交易全都是金融股票。

19 世纪中叶，特别是新兴工业的出现和工业结构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以巨额的资本积累。这就使得创办一个新企业所需的资金和生产要素已经不是独资合伙能满足的了。在这种情况下，1855 年英国认可了公司的“有限责任制”，1862 年颁布了“股份公司法”，促使股份公司得到了飞速发展。由于股份公司的优越性，加之一次次经济危机的威胁，不少独资和合伙的企业也纷纷改组为股份公司。于是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股份经济，便成为资本主义股份经济的典型形态。到 20 世纪初，股份经济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的国民财富有 $1/4$ ，甚至 $1/3$ 被股份公司所掌握。显然，股份公司已发展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世界资本主义前列。在这个进程中，股份经济和股份公司作为加速资本集中的杠杆，推进了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进而促使了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国际化的重要特征。进而，股份公司发展成跨国公司的基本组织形式，购买他国公司的股票也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资本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

济的发展，而股份公司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青春依旧，风彩不减：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1680 年成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如今上市公司达 500 余家，市价总值已达 905 亿美元，交易额为 216 亿美元。

巴黎证券交易所，1724 年巴黎证券交易所成立，是法国 7 家主要的证券交易所中最大的一家，也是世界著名的证券交易所之一。交易所交易业务主要是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两种。上市公司有 660 余家，总市值达 1534 亿美元，每年成交总额达 500~850 亿法郎。

伦敦证券交易所，1773 年，英国伦敦的证券交易所从露天市场迁入室内，伦敦证券交易所即宣告成立。伦敦证券交易所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证券交易中心。挂牌证券达 1 万种，居世界之首位，证券交易量，仅次于纽约、东京证券交易所，是世界第三大交易所。现有上市公司 2500 多家，其中外国上市公司 323 家，上市证券总市值达 1.37 万亿美元，交易额达 1506 亿英镑。

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于 1863 年正式启用该名，1871 年迁到华尔街 40 号，1903 年又迁到华尔街 11 号。排行美国九家主要证券交易所之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采取会员制，有 1416 名成员，其中本国成员 1366 名，外国成员 50 名。交易所共有雇员 3000 多人。上市公司达 1600 多家，有 2400 多种股票挂牌，日交易量超过 100 万股，上市股票总价值已超过 3 万亿美元，交易额已达 1.36 万亿美元。纽约证券交易所主要有五种经纪人从事交易活动：佣金经纪人、交易厅经纪人、零股经纪人、特种经纪人、自营经纪人。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额占全美的 80% 以上。

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是日本 8 家证券交易所中最大的一家，是仅

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世界第二大证券交易所。现东京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会员制(以前是股份制)的非盈利性的组织。东京的证券交易所有三种主要会员:正式会员、经纪会员和特别会员。其中正式会员 114 名(外国会员 22 名)、经纪会员 12 名、特别会员 144 名。上市股票达 1569 种,市场总价值达 1.8 万亿美元,交易额为 9485 亿美元,证券交易额占全国的 84.7%。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是加拿大最大的交易所,交易量占全国的 75%。目前,它的交易量仅次于纽约、东京、伦敦及香港联交所,名列第五位。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位于德国的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是德国最大的金融证券市场,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金融证券市场之一。正式上市的证券达 5400 余种,股票上市公司 800 多家,还有 1900 多家外国债券上市交易,市场总价值达 1798 亿美元,交易额达 6000 亿马克。

除此之外,在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证券交易所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虽然发展历史不及欧美久远。然而,对本地区和本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达议股票交易所,1956 年在南朝鲜政府的资助下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共同组建成立“达议股票交易所”。1963 年 3 月因发生大量欺诈行为曾被关闭。1963 年 4 月,达议股票交易所变更了组织形式,成为一家由政府管理的、非盈利性的公司,恢复了证券交易活动。近年来股票市场规模发展迅速。目前上市公司发展到 500 余家,交易量为 58000 亿南朝鲜元。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于 1973 年 5 月 24 日成立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同年 6 月 4 日作为一个独立的交易所开张营业。现有 320 余家公司的证券上市,市价总值达 1071 亿新加坡元,交易量达 200 多亿新加坡元。

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是由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

金银证券交易所和九龙证券交易所合并而成的,1986 年 4 月 2 日正式开业。会员共有 1081 人。在联交所上市的公司已达 300 余家,总市值达 5800 亿港元,交易额达 2000 亿港元。联交所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证券交易所。

那么,在中国是不是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步骤——开发资本市场,使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能不能吸收香港和南朝鲜的经验?连日来,在禹国刚的脑子里不停地闪现着一个个问号。

虽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但其股票的发行对社会融资的作用,是任何手段都无法替代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搞经济建设,就离不开金融支柱,只靠银行显得力不从心。但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禹国刚的思路又一次凝固了。

况且,股票交易确实带有投机性。因而在金钱的刺激下,许多高层人士跌入幕后交易的欲望,一个个丑闻不绝于耳。很明显,这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相去甚远。在中国能否搞股份制,发行股票乃至进行股票交易,有如斯芬克斯之谜。

3. 日本记者的“刀”问题

东京证券交易所,有股票交易大厅,厅内设有 6 个马蹄形交易台站,其中 5 个买卖本国股票,1 个买卖外国股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债券交易大厅、一个债券期货交易厅及一个国债大宗交易厅。交易活动完全电脑化作业。这里便是禹国刚的最后实习地。

“中国人也学证券投资了!”这在日本新闻界,乃至世界新闻界,真是一个爆炸性新闻。敏感的记者们似乎嗅到了中国未来的某种味道。

各路记者竞相来访。无奈,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纪律森严。王子、庶民均被拒之门外。虽然记者具有特殊身份,也无力越雷池半步。

《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可谓日本国两大权威性新闻机构。他们为能访到这一消息和照片，真是费尽心机。

最后还是《朝日新闻》记者技高一筹，采取迂回战术，绕东京证券交易所正门而不入，却径直找到日中友好协会，要求采访中国留学生。

作为促进日中文化交流，宣传日中友好关系的日中友好协会，责无旁贷地应该为这次采访安排机会，但又不能触犯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纪律。最后记者通过日中友好协会与东京证券交易所达成协议：为缩短记者在交易所的滞留时间，只许拍照，不得进行实地采访。

聪明的《朝日新闻》记者，自然答应全部条件。届时记者带上照像机出现在禹国刚面前，二话没说，镜头对准禹国刚，“连射”带“连发”，闪光灯照得禹国刚睁不开眼。记者临走时和禹国刚约好时间、地点，易地采访。这位记者先生可谓聪明过人，既没违犯“君子”协议，又达到了他此行的目的。

记者走了，禹国刚却为之忐忑良久。因为他不知道记者会提出什么问题，如果回答得不好，有损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形象，还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不良影响。《朝日新闻》可是向世界各国发稿的新闻机构。为恭候此次采访，禹国刚颇费一番思虑。

时间到，记者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可能是为提高自己的身价，抑或是宣扬《朝日新闻》在国际上的地位，记者见面便自我介绍说：他刚从驻外某机构回国，听说中国留学生在世界第二大证券交易所实习，特地赶来采访。寒暄过后，记者便进入了正题。

“你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搞股票？历来中国方面都没派过学证券的留学生，禹先生能否就这个问题谈谈吗？”

“真是狡猾！”禹国刚心中暗想。幸好，这个问题是他早有所料的。但回答起来也还是难度不小。说什么呢？如果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会搞股票。不

会搞股票交易，那么记者马上就会问既然不搞，为什么还派留学生来学习，这是不是浪费？如果说中国将来一定会搞股票交易，发展股份制企业，可是，谁授权他说这些话呢？

禹国刚淡淡一笑说：“学习总不会白学的，您说呢，记者先生？”他用这种反问式的方法，巧妙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记者深为中国留学生的机智而叹服，诡秘地笑了。

紧接着第二天《朝日新闻》在显赫的位置，发出这一消息，并登有禹国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照片，于当天把这一消息发往世界各地。

我国《参考消息》也在《朝日新闻》发稿的第二天转载了这一消息，国际舆论对此极为关注。新闻界人士更是投以惊奇的目光。人们本能地预感到中国将会有一次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全世界都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发展。消息传到团中央，也传到了中国改革的前沿——深圳。

4. 未来的股市老板玩起了电子

秋天，被喻为收获的季节。大地由翠绿变得一片金黄，辛勤耕耘的人们，此时的脸上才绽出笑容……。

1984年，秋。

禹国刚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两年的学业。中国人的勤奋和聪慧，给经济雄居世界前列的大和民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戏称日本人为经济动物，然而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勤奋，进取精神，也不得不为之深为叹服。

此时的冈崎嘉平太先生，好象完成了他毕生的一项重大使命。他终于亲手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证券管理人员。虽说是一批，事实上不过两个人。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建设中，他们力量显得太单薄了！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已迈出了第一步，这也许是历史性的一步。

禹国刚归心似箭，虽不敢说是衣锦还乡，但也称得上是满载而归。

当飞机在白云机场着陆时，他那颗激动的心几乎都要跳出他的胸膛，一种久别家园，重见母亲的心情油然而生，两行热泪不知不觉滚流两腮。

虽是中秋，但在祖国的南方，还不曾有一丝凉意，灼热的阳光下，禹国刚的眼睛急切地搜寻着他所熟悉的面孔。然而除了妻子到机场迎接之外，再没有别人。这和他们出国时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没有时间想得太多，第二天脚步匆匆地去组织部报到了。除了办理必要的手续之外，组织部没有什么新的安排，一度曾是雄姿勃勃的禹国刚，又悄悄地出现在爱华电器公司。

没有办法！因为那时中国确实没有股份制，也没有股票，更没有股票交易。自然也就更谈不上证券交易所了。

未来的股市老板，也只好暂时玩一玩电子了。禹国刚回到爱华电器公司之后，当起了这家企业的经理。

老板也好，经理也罢，不管干什么都要拿出点儿样子来，要不就别干！这是禹国刚的脾气。

爱华电器公司，是第一批来深圳投资的企业之一，当时有职工 400 多人。但是由于无活可干，400 多张渴望的嘴干张着，没有饭吃。企业处于亏损的重围之中。

党委找到禹国刚，宣布了党委的上述决定。“没的说，干！”禹国刚同意接任经理。“但，我必须有全权！”这下党委为难了。“你们如果不答应，我也照样无回天之力。这是深圳，竞争这么激烈，如果我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没有决策权，要层层报批的话，时机早成了别人手中的猎物。”禹国刚言出有理，党委不得不认真讨论禹国刚的意见。

实际上，禹国刚只是讲的企业内部机制。要想真正干好企业，内部机制是个重要前提，而更难的是如何去参与竞争，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几天之后，党委批准了禹国刚的要求，同

意授权。禹国刚走马上任。这是一个烂摊子，收拾起来谈何容易！

功夫不负有心人。用禹国刚的话讲，是他的运气好！当然这只是玩笑话。他走马上任之后，马上和日方谈成了生产 14 吋和 20 吋平面遥控电视。记住，那是 1984 年，就是现在这类电视机也还是时髦货。一台电视机就能净挣 600—700 元，合同一定就是年产 10 万台，一家伙就能挣多少钱？

爱华电器公司简直是发了！一时间，订单从全国各地如雪片一样，纷纷而至。容不得进库，各个订户的各种车辆早就恭候在工厂的门前。

更有意思的是：有个客户自称与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关系甚密，作为一般的经理，不过视这种话为玩笑而已，可禹国刚不放弃任何宣传厂家的机会。

“你认识马季？那好！让他给咱在相声里宣传一下爱华电器公司！”用户需要电视心切，听到经理话里有话，自然心领神会。结果在春节晚会上，马季还真的在相声里说出这么一句：你要买电视，到爱华公司。一语余音未平，厂里的订单却明显增加。这哪里是订单？分别是一笔笔财富。爱华人笑了！自从来到深圳他们还没见过那么多的奖金，更重要的是企业再也用不着背负那么沉重的亏损包袱。

出师得利，小战告捷。可禹国刚的心里，一直惦念着他所学的专业。因为以眼前的事实告诉他，有产品的旺销，就会有滞销。如果想使企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那就得不断地更新技术，更新设备，培训工人，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钱！钱从哪来？

照目前爱华电器公司的效益来看，银行贷款还不成问题。但长此以往，工人将会又一次失去危机感。大锅饭、铁饭碗，真正出现风险，工厂首当其冲，而工人们却袖手旁观，没有一点共担风险的意识。

爱华如此，全国的国营企业又何尝不是

如此?不仅就风险而言,还有许许多多更加宏观的东西。诸如资金短缺,国家税收,财政赤字,深化改革等等,无时无刻不在禹国刚脑海里上下翻腾。

中国到底需要不需要股市?他经常陷入这种困扰之中。

5. 中国不需要股市?

中国真的不需要股市?让我们一起看一组数据:1989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再加上手存现金,所形成的结余购买力已经达到了7500多亿人民币。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有如囚在笼中的猛兽,而市场在这个猛兽面前虚弱得无异于襁褓中的婴儿。一旦这只猛兽冲出囚笼,市场将不堪一击。

结果,这只猛兽真的冲出了囚笼:1988年一场抢购风后,把整个市场几乎荡为平地。

而另一方面,据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向全国人大代表报告说,1989年全部国家财政支出为3014.55亿元。而我们从统计报表中了解到,这一年(1989年)的财政收入才2810亿元,不折不扣的“入不敷出”“赤字运行”。就连农民交售完指令性计划内的农产品之后也得不到现金,手中只收到一张张欠账的“白条”。教育界人士大声疾呼“要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国民素质!”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说:“牺牲一点别的,也要增加教育投入”。但是很明显,教育经费增加与否,并不取决于教育经费本身。到1990年7月底,国家用于启动生产、启动市场的资金,已由全国银行发放了13151亿元的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了742亿元,是历史上同期贷款增加最多的时期。然而,资金紧张状况并无好转,要求增加贷款的呼声仍然强烈。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家还有400亿美元的外债和800亿人民的内债。进入90年代,便是还债高峰期。

国家资金短缺,政府囊中羞涩。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经费如何增法?“牺牲一点别的?”牺

牲什么为好?

国家真的没钱?百姓之中腰缠万贯。7500亿巨额,按1989年财政支出水平3014.55亿算,国家税务就是两年毫厘不收,也不会一贫如洗。

但用什么方法能吸引这笔巨额资金?使其流动有序,用于国家建设呢?能不能开拓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呢?

再来看深圳的情况:

深圳特区兴建10年,使其从一个荒凉落后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新型城市。10年来,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比建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51倍,国民收入增长了44倍,社会总产值增长了72倍;也就是说,反映国民经济总貌的三个综合指标均翻了5番以上。

经过10年建设与发展,全市引进外资28亿美元,协议投资55亿美元。外汇收入从1979年的2.4亿美元一跃到1989年的25亿美元。增幅高达10倍,基础设施逐步配套,投资环境日趋完善。

10年发展快,物价上涨也不慢,1989年全市消费物价指数比1979年上升了近3倍。1989年全市储蓄总量高达40余亿元。在没有更多的投资方面之时,犹如一只困虎,一旦出笼,物价冲击会十分严重。

这种现象,和整个国家的状况极其类似,开拓新的融资渠道,引导民众的投资方向,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以上的分析都是后话。

禹国刚回国之后,还在干着他的厂长。厂里的效益虽然可观,但他的心却时时牵肠挂肚地想着股市。先不去奢谈开拓股市对国家发展、对特区建设有多少好处,最低限度他也算是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了!

1984年底的一天,《深圳青年》记者突然造访,转天有关内容见诸报端。紧随后,《深圳特区报》接踵而来,禹国刚对于记者的采访并不感觉光荣无比,更无光耀门庭之悦,心中总为股市一事耿耿于怀。

但终于有一天他笑了。黎伯忠突然登门约见。这位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梁湘的秘书为何登门？难道是我们在经营上有什么越轨行为？禹国刚百思不解。

原来黎伯忠是慕名而来，并肩负市长、市委书记梁湘的使命前来与禹国刚晤谈。黎伯忠转达了市长、市委书记对禹国刚的问候，约禹转天到梁湘的办公室谈话。禹国刚心中一阵激动，他有生以来，还是头次见这么大的领导。第二天，准时到达。谈到过程得知原来市长有意到日本发行债券。市长目的有三：其一，提高深圳在日本的知名度，其二，筹集资金，其三，借此机会发展股市。

禹国刚闻此言，真是心花怒放，他终于盼来了机会，终于能够亲自搞股市了。于是当即表示：只要能干，我愿意随时接受命令。

但因事不成熟，中途搁浅。禹国刚的股市梦变成了泡影。此波未平，又掀一浪。时间不长，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行长秘书，打来电话，说是：行长张鸿义要与禹国刚谈谈，在什么时间方便？……

张鸿义行长，说话极简练，而且平易待人，与下级交往从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禹国刚初时的紧张心情，变得安稳多了。张行长问：“你愿不愿学有所长？”禹国刚当然愿意。他连日来的苦闷心情，使其坐立不安，夜难成寐。原因还不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行长这样问，那当然是一百个愿意！不过在行长的面前他还是有些耽心，因为他毕竟是半路出家

学证券。虽然在东京实习过，但经验上还是相差甚远。

张行长倒是喜欢年轻人这种谦虚、谨慎的处事态度。当即拍板，调禹国刚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工作。

但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禹国刚去了中行，就等于爱华电器公司失去了一员大将，400多的企业就要失去“总瓢把子”。作为爱华有限公司的老总，当然是不会同意。一员大将在手，可安半壁江山，这是太普通的道理了。

然而，张鸿义更是求贤若渴。因为张鸿义是站在历史的潮头看问题，他有着更深的打算。本来深圳的金融事业需要象禹国刚这样的人才。但爱华方面硬是不肯放人，处于无奈，张行长只得单刀赴会，造访爱华有限公司董事长。

双方见面没有寒暄，更没有客套，开门见山，直接切入。

“我银行离不开，可你们企业更离不开银行！”张行长话外有音地抛出这么一句。

然而这句话却正击中了董事长的要害。此时董事长正为筹集一笔款子而一筹莫展，见张行长话中有话，立即答腔：只要张行长能帮助解决贷款，我立马放人。在这君子协议之下，禹国刚调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已经是1985年的春天。经过如此漫长的周折，才刚刚踏上通往理想的起跑线……。

第二章 开国第一声

6. 大风起兮云飞扬

1986年，是深圳特区创建的第7个年头。

这个祖国开放、改革的试验基地，曾以她的高速度引起了国人乃至世界的极大关注。经过短短的7年建设，使这个边陲小镇一改

风姿，一派现代化的风貌，吸引了无数内地的热血青年纷纷而至。

深圳的有些作法，的确与众不同。政府的一些文件居然公开见报。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则消息引起了市民的格外兴趣：市委、市政府，在《深圳特区报》登出：新体制改革，公开在社会招聘12名局级干部。这在新中国的干部史上还是第一

次。就是在深圳，人们也是投以半信半疑的目光。

最为激动的应该说是那些从内地奔来的各路才子。他们有着良好的文化素质，有建设好深圳的热情，自然这则消息会在这一群体中激起波澜。人们一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迎接这次市委、市政府的检阅。

老实说，他们绝不是为夺得一官半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多少人会为一顶“乌纱”而如此狂热？他们只是把它视为一个机会，一个用自己的才华报效这片热土的难得的机遇。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在深圳金融界，小有名气的36岁才子——王健，却显得异常平静。论业务，他是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响当当、过得硬。论组织能力，他是深圳金融沙龙的牵头人。论开拓意识，是他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大面额存款证”，并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商业本票”，协助企业向社会集资。论实践，他还在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信托银行及经济研究部门干过。可这次他平静得有如一泓清溪。

凭他的人生经历，他认为这种招聘基本上是内定，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将内定的人员改头换面推上去罢了。

这个少年失去双亲，然后上山下乡的年轻人，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在他落难之时，穷得连件象样的衣服都买不起的时候，亲戚们怕受到牵连，都不肯出来帮他一把。而今象招聘局级干部这样的好事，又怎么可能落到他这个平头百姓的头上？大领导们哪个没有仁亲的俩厚的？尽管在这个弹丸之地，已经是人声鼎沸，而他却依然故我。

事有凑巧，一天，几个南开大学同来深圳的同学到王健这来玩，人们自然又把话题转向招聘一事。因为那几天招聘是整个深圳最为热门的话题。人们见王健无动于衷，便劝王健应当去试试，有的说：凭你的业务水平准没问题。可王健只是淡淡地一笑了之。

最后被逼无奈，王健只好谈出自己的想

法：你们以为光凭业务就能考上？这种事人家早就内定了，还能轮得到咱们去？

“唷，瞧这大话说的，好象你一考就能中的。”

“狐狸吃葡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我考？凭我的业务没问题！我太了解深圳的金融状况了。”王健说。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先别在屋子里说大话。”

“谁敢打赌？我要考上了怎么办？”

“你要是考不上怎么办？”

“我要是考上了，你们大家请我，我要是考不上，我请你们大家！”

“一言为定！”

就这样，王健被“激”进考场。

第二天，王健到组织部招待所去报名，那里已经等候了许多人，这是他早有所料的。

但临考试的那天，才是大大出乎所料！考场设在一所小学。整个校园里黑鸦鸦到处是人，不说上万，也得成千。每个教室都坐满了人，可这次只要12人呀！真可谓是万里挑一。如果没点实力，一见这场面肯定会被吓出考场。不过王健没有多少奢望，只是试试自己是骡子，还是马，到此遛遛而已。

铃声响了，紧张的考试拉开了序幕。整个教室几十号人，只能听到笔与纸摩擦后发出的沙沙声；一个个笔下生风，唯恐有哪个问题没论透彻。教室的空气是那么凝集，令人透不过气来，这个时刻应当说是不折不扣的竞争。

第一个回合之后，不少“才子”坠蹬离鞍，而王健却大爆冷门，业务考试名列第一。作为旁观者自然认为是王健大爆冷门。但这些年凭他在深圳工作的观察，对于深圳金融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都曾专门写过几十篇文章，探讨过，有些文章还在深圳得过奖，所以对专业考试，可以算得上是胸有成竹。

紧接着进入体检、政审、口试，都是关卡林立，稍有不慎就会人仰马翻。不知是老天有眼？还是武艺超群？王健一路上过关斩将，居然从考场上熬过来了。“和同学们打赌总是算